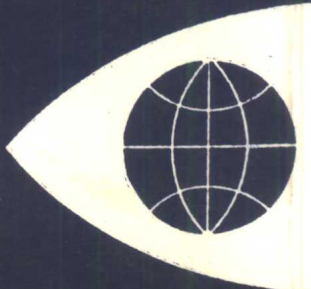


【美】 萧公权 著  
汪荣祖 译

#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 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康有为的名字，既象征着一个风云变换的时代，又包孕着亟待发掘的丰富内涵。他忧患元元的思绪，使之在实践层面上成为疾呼改革的活动家；他超迈磅礴的才情，又使之在精神问度上成为富于创意的思想家。上述双重动机构成了有机的张力，激励他既在儒家价值的范导下渴望着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以期当今世界能走向变法图强的中国；更在外缘文化的刺激下憧憬着儒家思想的自我递进，以期其命维新的中国能走向未来的世界。



【美】 萧公权 著

汪荣祖 译

本书责任编辑委 刘 东

#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 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编 著 者 [美]萧公权  
责任编辑 周文彬 杨健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激光照排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0.125 插页 2  
字 数 505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910-8/G·527  
定 价 27.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出版说明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迫切需要理论上的借鉴与创造。为此,我社在优先出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关于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著作的同时,也适当选择一些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较有影响的著作出版。海外学者占有的丰富资料,他们的研究视角和某些方法,对我们认识中国的国情,评估中国文化的传统、心态及其前景,从而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的建设,都有着启迪和借鉴意义。当然,他们的著作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甚至同我们存

在着某些原则分歧,这是需要读者加以认真审察和辨识的。同时,任何借鉴都代替不了自己的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要靠我们自己去中国当代的实践中去概括和总结。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丛书只求为此提供某种有益的参照和比较。如果这套丛书能在这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将感到欣慰。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不仅要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100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将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

动的文明。也正因为这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古老的中国警句便仍然适用，我们可以借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从几代学人的成果中撷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见解时，我们自然不能从各家学说中只挑选那些我们乐于接受的东西。如果那样做，这“筛子”本身就使读者失去了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但这次译介毕竟只是初步的尝试，成败利钝，欢迎论评。

丛书编委会 1988年

## 译者序言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是萧公权先生最后一部长篇学术巨著，原由英文撰写，先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学术期刊，后再汇集成书，补写家世与生平两篇以及教育改革一章，分为四编。今由汪荣祖译成中文，列入萧公权全集第七册。

萧先生深入研究康有为，文长40余万言，缘起于大批康氏未刊稿的出现。资料既备，萧先生以其精湛的哲学素养来治思想史，自如探囊取物，而且源源不绝。这批康氏未刊稿微卷即由萧先生赠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而流传台湾的。

萧先生以“平心”阅读康有为的未刊稿之后，对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巨子，有新的理解与论断。当英文原著出版后，有些读者认为作者于康虽有批评，然大体而言过于同情康氏，甚至有左袒之嫌。此种观点多少受到1911年以后革命史观的影响。事实上，萧先生本人早年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康有一章时，亦有所不免。如谓康氏反对革命，“貌似成理，而实多强辞夺理”，并谴责康氏“背宗邦而忠于殊类，谬误显然”。又谓：“康氏以立宪为保皇之手段，故其所号召者为假民权。托孔子以为变法之口实，故其所号召者乃假维新。”这些观点经深入检证后，都有所修正，



斯乃史家忠于文献、实事求是的态度。故所谓过于同情云云，不过是以“公心述”而已。

“现代中国”与“新世界”乃是贯通全书的两大要义，前者意指国家富强的追寻，而后者则在大同理想的寻求。是以康有为既是热情爱国的改革家，又是沉思于遥远的乌托邦建造者。粗心的读者或以为这是一种矛盾现象，甚或指责作者未能妥为调和康氏思想上的不一致性。其实并不是不一致，而是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既不在同一层次，便无矛盾可言。萧先生已在书中明说：

这种不相同的见解并非不一致，而仅仅显示康氏如何在他一生中的不同阶段，扮演两种不同的任务：在儒家原则上形成一改制哲学，以及建立一超乎儒家的广泛哲学体系。关于后者，他经常超越今文经的范畴，超越既存制度与价值观。关于前者，他遵从既被接受的社会与道德价值，以及注视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改制考》与《大同书》并不相互抵消，而代表思想的两个层次（见页 86）。

这一段话足以化解认为康氏思想矛盾者的疑团。

萧先生在这部书里，时而作广泛的比较研究，也就是说把康有为思想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视野来观察，因而每能见微知著。例如他首发康氏深受陆九渊与王守仁的影响；又如他首先指出康氏《物质救国论》实已发陈独秀、吴稚晖等人的先声；又如他在述论康氏经济改革的主张时，涉及现代化的成败问题，并旁及明治日本的现代化经验；又如他推演康氏大同学说时，与世界上其他的乌托邦理论比而观之，因而肯定康氏是一世界级的乌托邦建造者。类此，展示了一种精辟的“宏观”。

精辟的“宏观”之外，还有细致的“微观”。在纵横的议论中，未曾忽略必要的考证。诸如《大同书》成书的年代（见页 42）、康氏与廖平的纠葛（页 58～59），以及康氏是否真正的儒者（页 40）、对宗

教的想法(页100),都能推见至隐,不偏不倚,作持平的解说,读者可以覆按。

萧先生虽着力于康有为思想的研究,然于康氏的性格情怀,落墨无多,而神貌自显。当我们终卷之后,康氏那种欲与孔子比高的狂态,那种乐利自信的心胸,跃浮脑际,久久难忘。同时我们也不禁感叹,康氏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多“不幸而言中”,也不禁赞叹康氏对现代化以及工业化的见解,岂止没有过时,反而更加真切。例如他一再强调译书与派遣留学生的重要(参阅页348、481),以及政治改良与经济成功的密切关系(参阅页322~323、330、336)。他也见及工业化会导致世界化,因而在大同到来之前,工业化须不失为中国,也就是中国式的工业化(参阅页496~497)。类此识见,真可说是与时益新。长久以来,国人视康有为“反动”,因其反革命。但革命未及一世纪,终发觉必须回头走改革的路。改革之路,也就是康有为曾经指出的道路。这部书给我们提供了康氏道路的全图。

此书卷帙浩大,翻译费时,译者以一人之力,抽课余之暇,锲而不舍,勉强完成,殊无握管吟哦、斟酌字句的时间,无论在信、达、雅上,皆难臻理想的境地,愿海内外读者,不吝指正。

萧先生生前曾戏谓我曰,他的全集必是 Posthumous Works,不幸而言中,今屈指大师云亡已近6年矣!

汪荣祖

谨撰于维州柏堡之白舍

1987年9月23日

## 序 言

当我完成《中国乡村》一书，另找研究题目时，担任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国学院的助理主任梅谷教授(Franz Michael)交给我一批康有为著作的微卷照片，那是由已故赖特女士(Mary Wright)在40年代末，得自康同璧(康有为之女)的家藏。我发现此四大卷微片的内容，极为丰富，有的已经出版，有的仍是稿本，大部分为我前所未见。由于梅谷教授以及院中其他同仁的鼓励，我开始对康有为的思想作深入的研究。恰在此时，康有为的外孙罗荣邦来我们的学院作访问教授，他不但给我极有价值的建议，而且提供了更多的原始资料，我因而在特殊有利的条件下，从事此一研究计划。早年当我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戊戌变法一章时，我只看到一小部分的康氏著作。对他思想了解的不够，使我那时无法写出有深度的文章。我现在有机会改正一些从前的误解。

我的研究结果曾以论文形式，在《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清华学报》、《崇基学报》上发表。我现在重印这些论文合为一书，以符合近代中国研究会同事们的期望。除了一些小改动外，文字内容如

旧。第三至第六，以及第八章曾载《华裔学志》；第七章曾载《清华学报》；第十与第十一章曾载《崇基学报》。只有第一、第二和第九章是新写的。由于写作期间前后长达10年，并以单篇论文发表，不是前后相呼应的章节，因此书中重复与不一致之处难免。我已尽力免除这些弊病，但不可能尽除。这是我要向读者致歉的。

我写作此书的目标并不高，只想较为详细地检视康有为变法和大同思想的主要论点，并尽我所能将康氏思想与其所涉及所发展的历史环境相联系。希望这本书不致于是罗荣邦教授所编《康有为：传记和综论》(*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巨著的毫无价值的附篇。

我要在此感谢学院中同仁，在我研究期间给予的鼓励和批评。我特别要谢谢梅谷教授首先建议这一题目，以及罗荣邦教授的慷慨相助。我很感激三家学报的编者，允许我重新发表他们已刊载过的文字。我也要向郎玛格丽女士(Margery Lang)申谢，她精湛的编校技术，使有错误的原稿，转化成可资印行的文章。最后我要向戴德华(George E. Taylor)致个人的敬意。由于他的领导，使远东学院充满和谐而具启发的学术气氛。在这一气氛中从事学术研究，使我深感愉快而极有收获。

萧公权

1973年9月于华州西雅图市

# 目 录

---

## 译者序言 1

## 序言 1

---

## 第一编 家世与生平

- 第一章 家世 3
  - 第二章 生平 15
- 

## 第二编 哲学思想

- 第三章 儒学新诂 35
  - 第四章 以儒变法与以儒为教 83
  - 第五章 哲学的整合 118
- 

## 第三编 变法蓝图

- 第六章 政治改革 167
- 第七章 行政改革 228
- 第八章 经济改革 262
- 第九章 教育改革 332

---

#### 第四编 大同理想

第十章 到大同之路 363

第十一章 到工业社会的迂回路 455

---

跋：现代中国与新世界 530

---

引用书目 534

---

附录：萧公权先生学术次第（汪荣祖） 604

---



第 一 编  
家 世 与 生 平



## 第一章 家 世

康有为曾颇为得意地说,康家 13 世都是“士人”出身,未尝有一人执过其他的行业<sup>①</sup>。这一说法并不很实在。从他家世看,19 世纪前并未出过著名的学者,而且有些族人绝不是士人<sup>②</sup>。康氏大约在南宋时自南雄迁至南海,住在西樵山北麓的银塘乡(又称苏村)。首先择居于此的康氏祖先康建元,身世未明。康惟卿(建元后第九代)始读书。康涵沧(第十三代)曾在湖南任幕友职,时约在清初,有为认为他是康家“创业传绪之祖”<sup>③</sup>。

康家的地位在 18 世纪以及 19 世纪初时,逐渐上

- 
- ① 康有为,《自编年谱》(以下引作《年谱》),页 1; Jung-pang Lo, *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P. 23; Richard C. Howard, “K'ang Yu-wei (1858 ~ 1927): His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and Early Thought,” pp. 296 ~ 300 简略地说明了康有为的家庭背景。
- ② 康同壁,《南海康先生自编年谱补遗》(以下引作《补遗》),页 75; Lo, *K'ang*, p. 144, n. 2. 另见康有为撰,“诵芬集序”,载《康南海先生文钞》(以下引作《文钞》),第五册,页 33; 又见《康南海文集》(以下引作《文集》),卷八,页 1。
- ③ 康有为,“康氏家庙碑”。译者按:此文已收入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页 502。